



广州地区 粤方言语音研究

陈卫强 著

GUANGZHOU DIQU
YUEFANGYAN YUYIN YANJIU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广州地区 粤方言语音研究

陈卫强 著

GUANGZHOU DIQU
YUEFANGYAN YUYIN YANJIU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州地区粤方言语音研究/陈卫强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668 - 0040 - 4

I. ①广… II. ①陈… III. ①粤语—语音—研究—广州市
IV. ①H1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7736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86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 22.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陈卫强读硕士期间，就在我的课堂里完整地修学了“语音学”与“音韵学”两门课。我的课每一节都设有数组练习，让学生将自己的答案明白地写在黑板上或当场回答，然后评解、纠正，以巩固学习成效。很多人不大适应这一“高强度”的课堂训练法，但陈卫强坚持下来了，而且学得很认真。可以证明，他经过了严格的方言学基本功的训练。硕士毕业后，陈卫强报读我的博士研究生，继续攻读汉语方言学，这才成为我的入门学子。

作为一个语感较好，又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我希望他发挥自己的母语优势，以广州话音韵研究作为学位论文的内容。看上去这是一个老题目，做的人不少，但却有新的角度。我建议他将着眼点放在尚未系统调查过的广州市郊，以环形包围圈的方式对广州郊区粤语展开尽可能密集的调查，佐之相关研究成果与历史文献材料，以地理空间上的语音差异显示近代广州粤语语音的历史发展历程。随后，他进行了两年不间断的田野作业，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论文数易其稿，今天终于成书。看来基本达到了他预期的研究目标。因为材料充实，论证方法合理，这一研究总算有了些突破。比如运用音位学的理论，解释了广州粤语一套倒a韵母的产生就不乏创见；广州话元音高化的论证见解也不乏新意。我认为这些观点都建立在语言事实与客观分析的基础上，不尚大胆假

说，注重实证研究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当然，作为一名刚毕业的青年学者，论证不免还有些不尽到位的地方，借此就正于大方之家，也是他继续获得进步的空间所在。对于一位执著于家乡的方言事业，且孜孜不倦、愿为他所钟爱的事业献身的青年学者，今天尤为值得鼓励与赞赏。值此以为序。

伍 巍

2011年10月21日于暨南园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概说	(1)
第一节 广州地区地理历史概况	(1)
第二节 广州地区方言概况	(13)
第三节 广州地区粤方言调查研究述评	(16)
第四节 研究的目的、方法、价值和材料	(21)
第二章 广州地区粤方言的语音特点	(26)
第一节 广州地区粤方言的语音概貌	(26)
第二节 广州地区粤方言声母的特点	(41)
第三节 广州地区粤方言韵母的特点	(48)
第四节 广州地区粤方言声调的特点	(60)
第三章 广州地区粤方言声母的演变	(68)
第一节 精庄知章组声母的分合演变	(68)
第二节 船禅母读塞擦音和擦音现象	(78)
第三节 日、疑、影三母的变化	(88)
第四节 晓、匣母和云、以母的变化	(94)

第四章 广州地区粤方言韵母的演变	(112)
第一节 元音的裂化	(112)
第二节 豪韵的变化与高元音裂变的关系	(120)
第三节 介音的变化	(128)
第四节 主元音高化演变	(154)
第五节 ϵ 元音韵母的产生	(162)
第六节 阳声韵尾与入声韵尾的变化	(176)
第七节 合口音舌齿音字的变化	(193)
第八节 一、三等韵的分合变化	(203)
参考文献	(211)
附录 广州地区粤方言点分布图	(219)
后 记	(220)

第一章 概说^①

第一节 广州地区地理历史概况

一、地理环境

(一) 本书所称“广州地区”的地理范围

本书研究的地理范围为“广州地区”，涵括广州市所辖的十区二市（县级），包括越秀、海珠、荔湾、黄埔、天河、白云、花都、番禺、南沙、萝岗十区和增城、从化两个县级市，总面积7 434.4平方公里。境内主要方言均属于粤方言广府片中的广州方言。

广州地区秦朝时皆为番禺所辖。番禺县早于秦朝时已经设置，属南海郡。后因南来人口渐繁，生聚愈盛，番禺县才陆续析地而治。最早是增城，于东汉时分置。至明弘治二年（1489），从化分置。花县则迟至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析番禺、南海二县地分置。直至民初，番禺县境仍较现今大，属地涵括现今之白云、萝岗、黄埔、海珠及番禺等地。大致上，今白云区各镇及萝岗区的萝岗、九佛等地属慕德里司所辖，今黄埔、天河区属鹿

^① 本章参考《广州市志》（广州出版社，2000）以及各县区地方志，特此说明并致谢！

步司所辖，今海珠区及番禺区北部属菱塘司所辖，今番禺南部（沙湾、市桥、石楼一线以南除外。至清光绪年，沙湾、市桥、石楼一线以南仍为荒凉的“沙田”，直至民国末尚未成立独立的行政乡。如今之大岗、万顷沙等乡镇原属中山，南沙区原属东莞）属沙湾司所辖。游汝杰先生（2004）提到：“古代县的析置往往意味着人口及其方言的扩散，即子县的人民及其方言是由母县迁移过去的。”^[1]换言之，本书所研究的广州地区粤方言即早期之“大番禺”方言。

（二）广州地区的地理气候概况

广州地区地处祖国大陆南方，广东省的中南部珠江三角洲的北缘，接近珠江流域下游入海口。广州位于东经112度57分至114度3分，北纬22度26分至23度56分。东连惠州市博罗、龙门两县，西邻佛山市的三水、南海和顺德，北靠清远市的市区和佛冈县及韶关市的新丰县，南接东莞市和中山市。

广州全年平均气温21.97℃，市区年平均降雨量为1997.3毫米，整个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沛，终年常绿。

广州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中部是丘陵和台地，南部是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山地分布在从化市的东北部及增城市的北部，属九连山余脉。丘陵主要分布在市区的东北郊、增城市与龙门县交界处、从化市与花都区交界处。台地主要分布在从化市街口以东和温泉以南的中南部、增城市市区以东的东部、黄埔区南岗以南、番禺南沙以北等地。盆地平原分布在从化市以街口为中心的盆地、花都区的南部、增城市的南部、番禺区大部分地区及白云区等地。冲积平原主要分布在海珠区、荔湾区及番禺区，即珠江、东江及其支流沿岸。

广州地区位于东江、北江和西江的下游，珠江三角洲的中北部。全市河流归属珠江水系，其中东北部以山区河流为主，主要

河流有流经从化市、花都区 and 白云区的流溪河以及来自龙门县、流经增城市的增江河。南部为珠江三角洲河网区，主要为西、北、东江下游水道和珠江前、后航道错综交织而成的河网。

（三）广州地区的古今水陆交通

在古代，畜力、人力和漕运是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沿驿道和水路形成重要的交通线，因而东江、北江和西江三大河流是当时广州地区对外交通的主要线路。从广州溯北江而上，跨过南岭，即可进入长江流域。溯西江，经贺江或漓江北上，跨越五岭也可通长江流域。溯东江则可通闽越（今福建）。其中，北江作为广州地区北通中原的重要水道，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原。随后，派屠睢带领五十万大军南征百越，兵分五路南进。一路由今江西进入浙南、福建，攻取瓯越、闽越。两路进攻广西，其中一路经萌渚岭进入会稽县，一路经越城岭兵临桂林。其余进攻广东的两路兵马都经由北江南进，一路经今江西，越过大庾岭，进入粤北，下番禺；其二由今湖南，经骑田岭进抵番禺。

公元前 112 年，汉武帝派遣十万楼船水师攻打南越国，也是兵分五路南进。《史记》载：“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2]其中，伏波将军所走路线为湖南—骑田岭—连江线（按：汉桂阳郡，治郴县，地跨骑田岭南北，领 11 县，包括今湖南东南部和广东北部大部分县地。汇水，今连江。）楼船将军所走路线为江西—大庾岭—浈江线（按：汉豫章郡，治今南昌，领十八县，辖地相当于今江西省境大部。横浦，为秦筑关隘，即后来的大庾岭梅关），两路大军皆由北江南下，合攻番禺。而取道西江的“戈船、下厉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3]足见北江水道

之便捷。

东汉时期，粤北驿道历经多次修筑，交通条件得以改善，从广州地区北上多由此地。东汉建武二年（26），桂阳太守卫飒修筑自浚经浚阳、曲江、乐昌至郴州的通道，又称西京古道。建初八年（83），郑弘为大司农，“奏开零陵、桂阳峽道”^[4]。汉灵帝时（168—189），桂阳太守周憬也对武水（即武江）进行了疏浚。

东汉末建安二十二年（217），步骘把交州治所由广信县迁至番禺，修建赵佗故城，作为交州刺史部治所，自此岭南的政治经济重心开始东移。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广州地区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大片尚未开垦的肥沃的冲积平原吸引了大量逃避战乱南下的贵族和百姓入籍，人口激增。晋代以后，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从广州即可直航出洋，广州开始取代岭南西部的徐闻、合浦成为当时的重要港口。时至六朝，广州已成为岭南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港口城市。

唐开元二年（714），中央政府在广州设置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使，广州的对外贸易更加繁荣，成为唐帝国重要的出海港口，粤北旧有的通道已经不能满足南北交通的需要。唐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奉诏开凿大庾岭路，大大改善南北交通。自此，广州地区的水陆交通格局基本定型：以广州为出发点，向北溯北江而上，沿浚水到粤北南雄上岸，经大庾岭古道，入江西可通长江流域；向西溯西江，经桂江，过灵渠，就可进入湘江，与中原相通；循西江西去，可抵云贵、四川；向东溯东江，经惠州、潮州，入韩江，在大埔县的石上埠可与福建上杭县的鄞江、汀水相通，另有陆路到达粤东，通向闽南；短距离运输可经珠江三角洲河网抵达附近各县；海路运输则由珠江口出海，可达国内各港口及南洋、南亚，乃至西亚诸国。

近代以来，广州地区的现代化交通发展迅速。铁路建设方面，民国二十五年（1936），粤汉铁路全线通车，改变了以往北

上主要依赖水路的方式。粤汉线与南下的广九线、西行的广三线相连，大大促进了广州地区的陆路交通发展。而公路的大规模开筑则从民国元年开始，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已经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辐射省内外的公路网络。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的交通建设日新月异。京广线、广深线、广三线、广茂线和广梅汕铁路在这里交汇。辐射省内、连接省外的高速公路网络已基本成型。新白云国际机场是华南最大的民用航空交通中心。新开辟的南沙港和原有的黄埔港一道成为我国远洋航运的优良海港和珠江流域的进出口岸。广州作为华南地区当之无愧的最大的海、陆、空交通枢纽，有中国“南大门”之称。

二、历史沿革与人口变迁

（一）历史沿革

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期，广州地区已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在距今5 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居住在濒临河海湖泊的沙丘台地上，以渔猎为主。到先秦时期，广州地区主要为百越族聚居之地，各部落散居于岭南。《吕氏春秋》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

广州地区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管治范围，设置郡县，始于秦代。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岭南设立三郡，为桂林、象郡、南海。南海郡下辖番禺、博罗、龙川、四会、揭阳等县，郡治番禺，即今广州。番禺县与郡同治，境域广阔，北与浏江（今清远）相邻，东与博罗（今博罗、惠阳一带）相接，西与四会（今四会、鹤山一带）相连，南止于滨海之地。可见，当时的番禺县境较今广州地区要大得多。今广州地区在秦代属南海郡番禺县地。

秦末，群雄逐鹿中原，赵佗趁机起事。汉高祖元年（前206，一说汉高祖三年）赵佗建南越国，自立为王，定都番禺，历时93年。《汉书·地理志》有载：“南海郡，秦置，秦败，尉佗王此地。”南越国政制仍设郡及县两级，南海郡设有郡守官职，番禺仍为县治。

汉元鼎六年（前111），武帝派遣十万大军进攻岭南，次年平定了南越国，把岭南三郡析为九郡（九郡分别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置交趾刺史部。西汉末，交趾部改为交州。由秦至西汉，行政建置虽有更易，但广州地区仍属南海郡番禺县地。

东汉承西汉州、郡、县三级制，因经济和人口的发展，岭南郡县增置改易。南海郡上属交州（时交州治广信），下辖七县，比西汉多增了一县——增城县。《永乐大典·广字》引《图经志》曰：“后汉建安六年（201）始置增城县。”东汉时期广州地区属交州南海郡番禺、增城县地。

东汉末年，吴国孙权任步骖为交州刺史。建安二十二年（217），步骖把交州治所由广信县迁至番禺。孙权黄武五年（226），分交州为交、广两州。广州州治为番禺，辖南海、苍梧、高凉、郁林四郡。南海郡辖番禺、博罗、龙川、四会、增城、平夷（今新会，由四会分出）、揭阳七县，而番禺仍为州、郡、县治所在地。三国时，广州地区属广州南海郡番禺、增城县地。

晋末至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大量流民南迁，广州地区人口增长较快，郡县数量也随之增加。西晋永嘉之乱时，析番禺、博罗两县地建东官郡（辖宝安、海丰、兴宁三县）。东晋时的南海郡，领县增加了怀化、欣乐、西平（后二县在今惠阳地）和高要，并由番禺县析置怀化县。南朝刘宋时，广州辖十八郡，南海郡辖十县：番禺、怀化、熙安、增城、博罗、西平、龙川、高要、绥宁、始昌（由四会分出）。其中绥宁、熙安两县由番禺、

增城分出。南朝刘宋时，广州地区属南海郡番禺、怀化、熙安、绥宁、增城等县地。南齐时，广州郡数增至十六郡。南海郡域扩大，县数增加，《南齐书·州郡志》载有番禺、怀化、熙安、绥宁、增城、博罗、龙川、西平、高要、新丰（博罗分出）、河源（龙川分出）、安远、浔安等十三县。南齐时，广州地区属番禺、怀化、熙安、绥宁、增城县地。

隋大业三年（607），广州改为南海郡，领南海、曲江、始兴、翁源、增城、宝安、乐昌、四会、化蒙、清远、含涯、政宾、怀集、新会、义宁十五县。南海县即原番禺县。《元和郡县志》云：“南海县，本汉番禺县之地也，属南海郡。隋开皇十年以其地置南海县，属广州。”其中“番禺县”条又云：“隋开皇十年改置南海县，即今县是也。”《舆地广记》卷三十五“广南东路”条也载：“番禺县，秦汉旧县，后改为南海。隋平陈，分南海置，寻省入。”隋代，广州地区主要属南海郡南海县、增城县地。

唐初南海县仍依隋制，到武则天长安三年（703），由南海县分出番禺。天宝元年（742），南海郡辖番禺、南海、增城、四会、化蒙、东莞、浚阳、含涯、新会、义宁、怀集、浔水、清远等十三县。至德元年（756）置岭南节度使。咸通三年（862）分岭南道为东、西两道，各立节度使，岭南东道节度使治广州。唐代今广州地区属岭南东道广州南海县、番禺县、增城县地。

两宋时期，广州属广南东路，为路治，领南海、番禺、清远、增城、怀集、东莞、新会、信安八县。绍兴二十二年（1152）广州城一分为二，南海县管治城西，番禺县管治城东，《舆地广记·番禺县》即有“与南海分治郭下”一语，可为佐证。南海县与番禺县分治州城的状况一直延续至清代。宋代广州地区属南海、番禺、增城县地。

元代广州路属江西行省广东道。广州是广州路治所。至元十

六年（1279）设广东道宣慰司，广州置下路总管府，领七县一录事司。一录事司即广州录事司，专管广州城乡居民，建于至元三十六年（1299），七县为南海、番禺、东莞、增城、清远、新会、香山。元代广州地区属广州路广州录事司、南海、番禺、增城县地。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广州路改为广州府，辖一州十五县，即连州、阳山、连山、番禺、南海、顺德、东莞、新安（今宝安）、三水、增城、龙门、清远、香山、新会、新宁（今台山）、从化等县。其中从化县于弘治二年（1489）析番禺北部及增城小部地域设置。明代广州地区属南海、番禺、从化、三水、增城、龙门（部分）、顺德（大部分）地方。

清代广州府辖十四县，即番禺、南海、增城、东莞、新会、清远、香山、新安、顺德、新宁、从化、三水、龙门、花县。其中花县建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析番禺、南海北部山区设立。广州城仍分为两半，西属南海县，东属番禺县、清代广州地区属广东省广州府番禺、增城、从化、花县以及南海、顺德、三水、龙门等部分县地。

民国初期，广州地区属粤海道，相当于广州府下南海、番禺、增城、从化、花县五县地。1918年10月，广州成立市政公所，筹备建市。1920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划定广州市区，置市政厅，总理区内市政。1921年，广州市区正式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域，结束了宋代以来行政上分属南海、番禺两县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地区的行政区域辖属几经调整。1960年9月20日，国务院批准原由佛山专区领导的花县、从化两县划归广州市领导。1975年3月24日，国务院批准将佛山地区的番禺县、惠阳地区的增城县划归广州市领导。至1988年，广州市行政区域管辖范围包括东山、越秀、荔湾、海珠、天河、黄埔、芳村、白云等八区和花县、从化、增城、番禺等四县。2000年6

月，番禺、花都撤市设区。2005年，撤销芳村区和东山区，新设立萝岗区和南沙区。至此，广州市共辖十区二市（县级），包括越秀、海珠、荔湾、黄埔、天河、白云、花都、番禺、南沙、萝岗十区和增城、从化两个县级市。

（二）历代人口变迁

1. 广府民系的形成

广州地区地处南陲，北阻五岭，古时居住着南越族，言语风俗与中原汉族迥异。他们创造出以种稻，制造并使用有肩石器、扇形青铜钺、几何印纹陶和舟楫，凿齿、断发文身、鸡卜等为主要特征的南越文化。近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铜提箭上，刻有羽人划船纹饰，船上悬着一个人头，生动再现了古代越人善舟楫、鸟图腾崇拜、猎头等独特的生活习俗。西汉时，南越王赵佗为巩固政权，采取尊重越俗、“和辑百越”的政策。他任用越人吕嘉为相，主动“弃冠带”，着越服，“椎髻箕踞”，自称“蛮夷大长”。可见，当时南越国还是以越人为主体的。一般认为，如今的壮族、黎族和疍民皆为古南越族的后裔。一直到南北朝和隋代，广州地区还居住着不少壮族、黎族等少数民族居民。《南齐书·志第六·州郡上》“广州”条说：“虽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5]《隋书·列传第三十》“薛世雄”条说：“炀帝嗣位，番禺夷獠相聚为乱，诏世雄讨平之。”^[6]后来，这些民族的居民有的逐渐汉化，有的迁移至偏远地区，只有一些地名还保留着他们居住过的痕迹，例如现在的番禺区南村镇就有“俚人洞”。

中原汉族人民大规模迁移岭南始于秦代，主要有三次高潮：秦汉时期、两晋南北朝时期和两宋时期。其中，除秦始皇和汉武帝时因南征而派遣大量军人占籍岭南外，其余几次都是因为北方战火纷扰，黄河流域一带社会动荡，士民为避战祸而被迫南下。

这些来自中原的军人和士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生活用器以及中原的语言和礼俗，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流，并逐渐与当地的原住居民融合为一体。这种民族融合的历史也得到了遗传学的证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先生的“姓氏基因”研究发现，以武夷山—南岭为界，南北汉族的血缘差异很大，甚至比南北两地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异还要大。^[7]可见，南北两地汉族是在与当地少数民族的逐渐交融中形成的。

据练铭志先生（2000）的研究，历史上较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有两次。第一次民族融合是在南越国时期。南越王赵佗鉴于暴秦灭亡的教训，推行民族和睦政策：尊重百越风俗，任用越人为官，提倡越汉通婚等。这个越汉民族的融合体，逐渐成为后来广府民系的先民。南北朝时期，由于各地汉族大量涌入，促进了俚汉文化交流，加上俚人首领冼夫人“戒约本宗，使从民礼”，更加速了俚人对汉文化的吸收。于是，广东出现第二次民族融合——俚汉融合。这次民族融合，始于晋，发展于南朝，隋唐之间进入高潮，结束于唐初。《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高州府部汇考三》“风俗”条云：“自隋唐之后，渐袭华风，休明之化，沦洽于兹。椎跣变为冠裳，侏离化为弦诵；才贤辈出，科甲蝉联，彬彬然埒于中土。”^[8]

两宋之交和宋元之交，金兵和元兵的南下侵扰触发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史载“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使得“宋代南迁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了汉、晋和南朝”。^[9]现居番禺市桥的谢氏村落有《石桥谢氏族谱》，当中所载的《流徙铭》，就罗列了罗姓至高姓共33个姓氏的珠玑巷流民南下垦荒的事迹：

珠玑流徙，罗湛郑张，尹文苏谢，陈麦卢汤，温胡赵伍，曹区李梁，吴冯谭蔡，阮郭廖黄，周黎何陆，高发其详。九十七